

挑战

中国环境记者调查报告

| 2010年卷 | 汪永晨 王爱军 主编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挑战

中国环境记者调查报告

| 2010年卷 | 汪永晨 王爱军 主编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挑战: 中国环境记者调查报告, 2010 年卷/汪永晨, 王爱军主编. —北京: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2012.3

ISBN 978-7-5111-0869-2

I. ①挑… II. ①汪… ②王… III. ①环境保护—调查报告—中国—2010 IV. ①X-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10609 号

责任编辑 陈金华
责任校对 扣志红
封面设计 玄石至上

出版发行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100062 北京东城区广渠门内大街 16 号)
网 址: <http://www.cesp.com.cn>
电子邮箱: bjgl@cesp.com.cn
联系电话: 010-67112765 (编辑管理部)
发行热线: 010-67125803, 010-67113405 (传真)
印装质量热线: 010-67113404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版 次 2012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960 1/16
印 张 20
字 数 260 千字
定 价 42.00 元

【版权所有。未经许可，请勿翻印、转载，违者必究。】

序

2010 的中国环保：一言难尽

王爱军^①

对 2009 年的中国环保，我曾经用“纠结”一词来形容。那一年，要应对世界金融危机，中国实施了数万亿元投资的项目，危机当前，环保成为“想抓又不想抓”的“纠结”的事情。而“萝卜快了不洗泥”的后果，也许要过些年才能看到。

2010 年的环保，如果仍想用一個词汇来描述，很难。既有上海世博会对“低碳”的青睐和实践，也有频发的泥石流灾害、水污染事故刺痛人们的神经；既有全球气候变化开始引起重视的欣慰，也有水资源短缺、城市拥堵等“零距离环保问题”给民众带来的困惑。

总而言之，环保在经济高速发展的社会中的弱势地位，依然没有根本性的改变：环保立法没有取得新的进展，环保主管部门有限的发声依然孱弱，公众参与依然步履维艰，环境事件也没有出现大幅减少的趋势。

我们先来看一个典型的案例：

2011 年 4 月 25 日，环境保护部以“工程未经环评验收即投入运行”为由，向胶济铁路客运专线有限责任公司下达《督促履行通知书》，责令

① 本文作者现任《新京报》编委、评论部主编。

该公司于5月31日前，停止使用改建铁路胶济线增建四线工程。

然而，最后通牒没有起到作用，胶济铁路客运专线至今仍在“违法”运行。

其实，这已经不是环境保护部对胶济铁路客运专线下达的第一个决定，此前还有两个。三道“通牒”都成为空文。两部委顶牛，环保部门败阵。

其实，正如有论者所言，环保部门并非没有“杀手锏”。从法律责任追究而言，《刑法》规定了“环境监管失职犯罪”，而对已经生效的处罚决定，如果对方不执行，环保部门可以提请法院强制执行；而从行政问责来看，监察部和国家环境保护总局2006年就发布了《环境保护违法违纪行为处分暂行规定》。

对那些抗拒环保部门“通牒”的国家工作人员，这两个层面的处罚措施都是适用的，可惜的是，所有规定都被虚置了。

有媒体发问：三道“通牒”形同废纸，环境保护部作为政府部门的权威何在？环保法律的权威何在？

这种发问，何尝不是民众的心声？

2010年，还有一场特殊的“考试”到了交卷时间。国务院2007年批转《“十一五”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考核办法》规定“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10%”为“约束性指标”，并将减排是否达标和官员政绩挂钩，甚至传出“完不成任务一把手免职”的狠话。

2011年8月29日，环境保护部新闻发言人把“十一五”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五大电力集团公司的“考试成绩”对外通报——环境保护部会同发展改革委、国家统计局、监察部近日联合完成了2010年度及“十一五”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五大电力集团公司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情况的考核工作。结果表明，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以及国家电网公司和华能、大唐、华电、国电、中电投五大电力集团公司都较好地完成了《“十一五”期间全国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控

制计划》下达的总量控制任务。

“全面完成”的结果似乎并不意外。因为有“一票否决”的政绩压力，各级官员自然不敢怠慢，所以我们看到一些地方在最后一年使出的各种绝招——有压缩高能耗项目的，有发电机组停止运转的，更多的是拉闸限电……

本书调查报道《拉闸限电：行政压力下的节能怪胎》记录了这种怪现象。河北衡水市安平县对全县 98 条线路分 3 批实施有序限电，每供电 50 个小时停电 22 小时。河北省枣强县实行“无差别限电”，每天供电 4 小时；山西省晋城市居民生活用电 1 个月被停 14 天；安徽省全椒县拉闸限电，医院做手术要靠发电机。

此事后来惊动了总理，发改委也承认失误并向民众道歉。国务院办公厅随后下发紧急通知，要求各地立即恢复受影响的居民生活等重点用户的供电，不得非法干预电网调度和发电生产。

不管怎么说，行政高压之下，任务是完成了。在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实现这样的成绩，不易。2011 年，“十二五”规划开始，盲目铺摊子、上项目，以及“十一五”期间尤其是最后一年污染物减排总量被人为控制会不会出现报复性反弹，令人担忧。

我们再来看环境保护部如何评价 2010 年。《2010 中国环境状况公报》披露了这样一组数字：

2010 年，全国化学需氧量排放总量 1 238.1 万吨，比 2009 年下降 3.09%；二氧化硫排放总量 2 185.1 万吨，比 2009 年下降 1.32%。与 2005 年相比，化学需氧量和二氧化硫排放总量分别下降 12.45%和 14.29%，均超额完成 10%的减排任务。

河海污染依然严重。其中，长江、黄河、珠江、松花江、淮河、海河和辽河七大水系总体仍为轻度污染。湖泊（水库）富营养化问题依然突出，在监测营养状态的 26 个湖泊（水库）中，富营养化状态的占 42.3%。

2010 年，环境保护部共接报并处置突发环境事件 156 起（2009 年是

171 起), 减少 8.78%。其中水污染事件 65 起, 大气污染事件 66 起, 海洋污染事件 10 起。

和整个环保领域在社会舆论层面波澜不惊一样, 这些数字并没有被公共媒体广泛报道。或许是因为, 这些数字变化不大, 年年相似, 面孔依旧, 没有太大的新闻价值; 也或者说, 环保部门自说自话的工作总结, 缺乏年度性的事件细节, 很难提起民众的关注兴趣。

比如, 2010 年环保部接到或处理环境突发事件 156 起, 其中重大环境事件 5 起, 较大环境事件 41 起, 一般环境事件 109 起。这些事件分别是如何发生的? 处分了哪些人? 对受害者是如何赔偿的? 善后措施如何? 能否避免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我们知道, 按照《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这些都应该是公之于众的。如果把这些事件的十分之一通过公共传媒进行披露, 每个月有一起案例, 对增加环境保护部门的话语权、促进民众的环保意识、惩戒破坏环境行为, 会起到怎样的推动作用啊。

记得当年不时刮起“环保风暴”的时候, 民众被告知不要对“风暴”过于关注, 而要关注常态化的环境保护。当时, 就有人担忧“风暴”没有了, “环保”会不会也同时消失? 数年过去, 相信每个人心里都有一杆秤。

但是, 无论如何, 环保, 作为世界性的潮流、作为中国所面临的突出问题中的一个, 是不应该这么“静悄悄”的。

二

好了, 现在, 我们来看看这一群执著报道中国环境的记者们, 在 2010 年留下了怎样的足迹。

我用了几乎一整天的时间细读了汪永晨的《2010“江河十年行”纪事》。这是他们“十年行”的第五年。

记得去年, 我曾经对汪永晨说, 你写得太长了, 明年能否短一些? 现在, 我决定改变看法, 我知道, 他们起早贪黑行程数千公里, 看到的、

听到的、想到的、感受到的东西实在太多，完全可以出版一本专著，几万字的容量可能只占他们想表达的十分之一。

看完《2010“江河十年行”纪事》，有几个突出感受：

一是前几年没有解决的问题，至今仍在解决之中，没有太大的变化。

二是大江大河边没有因建水电站而移民的地方，居住者日子都过得相当轻松，也许他们不那么富足，但是，他们的心里是充实的，精神是愉快的。他们对脚下的土地有着那么深刻的依恋和情感，而他们都对将来可能进行的“开发”表示出深深的恐惧和忧虑。

三是因建电站而移民的地方，很少听到满意的声音，看到轻松的笑容。他们甚至想回到过去，过上曾闻鸡犬共鸣的日子，但他们也知道这已经不可能了，水库移民成为“问题”，也许要随着时间推移而“问题”下去。

四是“稳定”成为地方政府的核心工作，和过去对记者们的围追堵截不同，这次时不时有官员“陪伴”他们考察，还有的安排他们吃住，为的是不让他们“乱说”。地方官员们也有一肚子的苦衷，甚至说“如果不当这官，说不定也去搞环保了”。是什么让民众与地方政府之间的隔阂这么大？地方政府言说的“造福民众”为什么与当地民众的感受有那么大的落差？

五是曾经美丽的河山，还在一点点发生着变化。在一些都市，环境问题逐渐变得好起来，而在偏远的深山河谷，环境恶化的趋势没有被遏制。建电站的大江已经截流了，可是环境影响评价还没结束。记者们接到了好几份移民的诉求书，可是“我们也不清楚，这些诉求书送给谁看”？这些“沉没的声音”随着江河变平湖而沉入湖底，没有人“打捞”。一任那些淳朴的乡民苦着、哀求着，老去、死去。

在这个浮躁的时代，大约没有人愿意用十年的时间去回访那些被遗忘的国土的一部分、国民的一部分，记录他们的苦难和改变。他们其实做不了什么。但是，当他们回到“定点探访”的村落和农家，围火而谈，

粗茶淡饭，迎接他们的是朴实的感谢和心灵的共鸣。

“我们走得太快了，停下来，等等我们的灵魂。”“江河十年行”，不只是一次环保行动，而是一次给灵魂找“家”的行动。

生态系统值多少钱？或者问，生态系统能以金钱换算吗？《生态系统价值几何？》告诉你，能够换算，也不能够换算。

有研究人员对全国主要陆地生态系统价值进行了测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总价值为 9 170 亿元/年，其中来自森林生态系统、草地（牧场）生态系统、湿地生态系统、荒漠生态系统和农田生态系统的价值分别为 1 410 亿元、1 030 亿元、109 亿元、981 亿元和 1 390 亿元。

这个数字是惊人的。如果它真的变成货币，像山一样堆在那里，破坏环境的人可能会产生一些不舍。可惜，这些价值以看不见的方式存在着，即使是破坏了，这些价值也往往被人忽视。

但也有人认为生态价值无法估算。因为，“对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进行经济价值评价，其难度并不亚于预测地震”。

我们的悲剧在于，保护一项东西，往往要知道它准确的金钱价值。珍藏一件文物，不是看重它的艺术品位，而是看它在市场上能卖多少钱。我们的环境值多少钱？问这个问题，如同问“我们的教育值多少钱”，“我们的健康值多少钱”。谁能给出答案？

令人欣慰的是，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的保护意识，在中国已经开始艰难树立。知道它珍贵，保护就是了。

“若能分配全球 GDP 的 1% 来应对气候变化，到 2030 年，人类将会在空气、水和人类健康改善上得到巨大的回报。”问题是，人类愿意拿出这 1% 吗？

“子非鱼，焉知鱼之乐。”这是古语，有哲理，也很有点浪漫的意思。但是，问问现在长江上游的鱼们，恐怕要说“子非鱼，焉知鱼之悲”了。《博弈小南海》这篇报道，似乎可以听到一些环保人士为大自然生灵的生存而代言的呐喊声，但这些声音在人类的欲望和强势之下，显得多么

无力。

一个自然保护区，有法律的保护，似乎可以高枕无忧了。但是，人们发现，以法律的名义依然可以合法地改变它。一场仍旧没有结束的博弈，牵连了经济与生态、地方与中央、政府与民间、动物与人类、法律与潜规则等复杂因素，站在不同立场上的人们博弈、博弈再博弈。可是，如果，那些鱼儿会说话，它们会说些什么？

与长江上游的鱼的命运有些相似的是，生活在西部狩猎场的动物们。调查报告《中国狩猎场：荒野里的枪声》记述了它们的命运。它们已经被列入法律保护名单，但一直被人惦记着，“要不要让外国人杀几头”的议题也前仆后继地呈上谈判桌。

狩猎场、地方林业机关、中外专家学者，以及国家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狩猎代理机构，甚至一些国际猎手，都在试图重启国际狩猎这扇大门。

早在 2006 年，中国的一些地区和商业公司有组织地猎杀野生动物就被媒体披露过，因为社会各界反对声太大，国家林业局最终不得不叫停狩猎权拍卖会。

而就在 2011 年的夏季，突然又有消息说国际狩猎即将成行，而且已经通过了有关专家的论证会，只待国家林业局批准。这次，依然延续了上次的逻辑轮回：媒体报道→社会反对→国家林业局叫停。

可以发展经济，可以安排就业——开展狩猎有着“充分”的理由。再过几年，会不会再来一次这样的轮回？而那些可怜的生灵，能否再次逃过时刻准备射击的枪口？

现在，也有一种声音很有力，就是“狩猎是野生动物保护的一个有效手段”，这和“中国动物真的多到了需要杀戮的程度了？”形成“争论”的局面。其实，这种争论永远无解。有人想拿国外的例子来证明狩猎正当而无害。但是，我更担心，一旦放开口子，在法纪废弛的当下，谁能管得住那些肆意的猎枪？面对这个“中国难题”，唯一的解决办法可能就

是：一律叫停。不杀，是最好的防止滥杀。

2010年8月7日22时许，甘肃省舟曲县突发强降雨，继而形成特大泥石流灾害，造成数千人受伤，近2000人死亡（失踪），震惊中外。

调查报告《泥石流的人为影响》，忠实地记录了那场灾难，类似“3个兄弟8个孩子睡梦中被掩埋”的细节，会让人掩卷落泪。人们在问：是什么导致了这样的灾难？

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舟曲当年茂密的森林植被被砍伐殆尽，停止砍伐后，蜂拥而起的小水电又让本已脆弱的自然彻底失去了骨架而不堪风暴一击。

“舟曲曾有国家直属的923林厂，鼎盛时期有600多工人——灾难发生前夕，这座林场依旧存在，还有50多人，只是这次泥石流几乎把整个林场办公区彻底掩埋。”——读这样的文字，一种悲怆油然而生。

当年那些砍树的林场职工，一定不会想到几十年后他们的子孙后代会遭受这样的灭顶之灾，正如现在依然坚持“人定胜天”的人们，不会想到子孙后代靠什么生存。中国曾经流行“报应说”，但在失去信仰、盲目张狂的时代，这个“人在做，天在看”的古老理念也被抛之脑后。

多难兴邦。舟曲之“难”，能否换来邦之“兴”？

复杂的世界，并不都是让人沮丧，上海世博会的“低碳”实验，给中国2010年环保抹上了一层亮色。

上海世博会的建设贯穿了低碳的理念，而世界各国建起来的各种“馆”也不约而同地体现着这种理念。具体情节，可参看调查报告《上海世博会：八载低碳环保路》。

其实，世博会的环保实践验证了，在中国，环保可以大有作为。中国不缺乏创意，不缺乏技术，不缺乏资金，缺的正是理念的深入人心。而吊诡的是，凡是与“世界”有关的、体现中国形象的活动，都能够和世界的发展趋势、先进理念完美嫁接，如奥运会的“绿色北京”。什么时候，“不用扬鞭自奋蹄”，我们自己能把环保理念像世博会那样一以贯

之？

和 2009 年哥本哈根国际环境会议的热闹不同，2010 年底的坎昆会议似乎没有引起中国社会的高度关注。《从哥本哈根、坎昆到未来：气候谈判是场持久战》的作者亲临这次会议的全过程，这篇报道让我们看到，源于复杂利益的纠葛，环保之于国际，原来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简单。

中国代表团在这次气候谈判上表现出色。有坚持也有妥协，保证会议有了一些成果；而尤其值得记一笔的是，中国代表团吸取上次哥本哈根会议的教训，直面世界媒体，以公开透明回应质疑，既传达了中国的声音，也指出了气候谈判的症结所在以及一些发达国家在这个问题上的推诿心态。

气候谈判的确是一场持久战。持久战容易造成人们的疲惫和麻木，但是，这也是考验耐力和信心的绝好机会。从一个侧面看，一次比一次自信，一次比一次成熟，也是中国走向世界的写照。

直接影响城市人生活质量的两大因素：洁净的空气和水，越来越受到重视；而北京无疑具有“大城市病”的解剖意义。

《北京治堵》说的是堵车，但在我看来，不如说指的是空气质量。车太多，堵车并不是最可怕的，可怕的是尾气造成的污染，而且，这会伤及那些没有开车的人。北京市经过努力，严重影响空气质量的首钢和小煤炉，正在退出城市，而 500 多万辆汽车，迅速补缺。于是，北京的空气完全取决于老天爷的脸色——刮风，而且要刮“中风”——风大了，会带来沙尘；风小了，赶不走颗粒物。

可怕的是，人们往往关注堵车，提出的措施也是缓解堵车，而车多带来的空气污染，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还有水。北京一是缺水，二是水污染。《北京水资源危机》中说，北京水资源的人均占有量约为 300 立方米，是世界人均水平的 1/30，远远低于国际公认的人均 1 000 立方米的下限，属重度缺水地区。而在郊区的许多河道，水被污染的情况比比皆是。

北京还在扩大，人口还在增长。几乎所有人都说，北京必须减少城市功能。北京是“全国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同时还是国际交往中心、知识经济中心、科技中心、教育中心、高新技术研发中心、金融管理中心和国际化大都市为一体的多功能超大城市”。可是把这些职能移至外地，又舍不得。纠结之中，问题就会一直存在下去。是到了决断的时候了。

2010年7月3日，位于福建上杭县的紫金山铜矿湿法厂突发渗漏事故，外渗污水量约为9100立方米，导致汀江大量鱼类死亡，由此引发了2010年轰动全国的“紫金矿业污染事故”。

《紫金矿业“污染门”真相》披露了不少细节，让我们得以窥见这起罕见环境事故的来龙去脉。如果不是汀江鱼类的大量死亡，如果不是下游广东水域的被污染引起高层注意，这起事故很可能会像以往那样继续被隐瞒下去，或者会把责任推给天气而不了了之。

为什么紫金矿业污染事故屡禁不止？背后原来是和当地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有的官员在企业有股份，有的官员退休后成为企业高管，而这个企业成为该县70%的财政收入来源……这让监管者如何能硬起手来？

而频频发生的污染事件，是不是都能从紫金矿业污染事件中找到类似的原因？

三

这本《中国环境记者调查报告（2010年卷）》是每年一本环境记者调查报告的第五本。从选题、采访、写作、编辑、出版，一群人利用业余时间要忙上大半年，几乎没有报酬，也得不到什么名利，是什么让他们不愿放弃？

2010年10月28日，自然之友创始人之一、会长梁从诚先生逝世。

梁从诫先生，是中国环保的先行者，是中国环保 NGO 的奠基者。做环保，首先要是一个公民。“公民社会需要的是不依附于各方独立存在的，能够独立思考、担当的力量，梁从诫应该是一个标杆。”

看完《先生从诫》，许多问题可能会一下子想明白。我把一些段落引用在下面，能读到此书的读者朋友，或许也能感受到，在这样讲求实际的时代，为何有人会如此专注于一个出力不讨好的事业？

环保不是轻柔的田园诗。虽然环保的目的是让我们能有一个诗意栖息的环境，但通往诗意的道路却并非坦途。

他（梁从诫）看到穷苦的村民在野外挖发菜谋生。虽然这种挖掘会破坏当地脆弱的环境，但看到那些在野地里挖掘的孩子，他却难以开口劝阻。“挖发菜不好，破坏草原以后会更受穷。”这样的话在梁从诫看来太居高临下和残忍了，唯有心酸。他后来对其夫人方晶说：“对于贫穷和吃不饱饭的人来说，环境保护是一种奢侈品。做环保宣传，首先要关心百姓的疾苦。”

种种冷遇和屡屡未见成功地呼吁环境保护，让梁从诫常常感到无奈与无助。像是一个人大声呼喊，而那些话语却在一片喧嚣中沉寂，没有声音。但梁从诫仍然坚持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他说，我没有什么专业，也不是什么专家，我就是个想干点事情的人。这个国家是我们的，地脏了，总得有人扫吧。

致力于这本书的环保记者们，可以说是站在梁从诫先生这个“标杆”的一群，他们秉承“自家的地脏了，总得有人扫吧”的朴素理念，即使是“身不能至”，但也“心向往之”。

希望这样的人越来越多。这样的人多了，我们的环境就会好起来。

目 录

- 序 2010 的中国环保：一言难尽 /王爱军 1
- 生态系统价值几何？ /章 轲 1
- 紫金矿业“污染门”真相 /邵芳卿 20
- 泥石流的人为影响 /杨万国 38
- 北京治堵 /陈晓凤 55
- 先生从诚 /明四新 75
- 从哥本哈根、坎昆到未来：气候谈判是场持久战 /袁 瑛 90
- 中国狩猎场：荒野里的枪声 /章 轲 106
- 北京水资源危机 /王 建 周 晨 131
- 博弈小南海 /杜悦英 143
- 上海世博会：八载低碳环保路 /胥会云 163
- 拉闸限电：行政压力下的节能怪胎 /杜悦英 181
- 2010 “江河十年行”纪事 /汪永晨 199

生态系统价值几何？

章轲^①

摘要：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等自然资源的价值没有得到应有的承认和理解，尚未进行市场化，这是导致生态破坏和生物多样性减少的一个重要原因。但对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进行经济价值评价，其难度并不亚于人类对地震的预测程度。记者了解到，建立生态补偿机制已经列为中国政府“十二五”规划中环境保护的内容之一，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价值评估正是建立生态补偿机制的一项重要基础。

关键词：生态系统 生物多样性 经济价值 生态补偿机制

中国每年的工农业产值是可以价值计算的。那么，自然界为人类提供的服务和产品也是有价的吗？答案是肯定的。

中国的科学家们早在几十年前就开展了这项研究，比如，研究显示：黑河流域生态系统的价值。在 1987 年该流域生态系统总的经济价值为 2.16 亿美元，相当于 17.9 亿元人民币；而在 2000 年其价值下降为 1.77 亿美元，相当于 14.6 亿元人民币，是 1999 年黑河流域 GDP（10.3 亿元）的 1.425 倍。

① 《第一财经日报》首席记者；中国环境新闻工作者协会理事、首都编辑记者协会理事、中国环境文化促进会传媒委员会理事、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环境经济学分会委员。撰写过大量有影响力的环境新闻报道。

湖北省神农架林区的价值。2004 年的统计显示, 神农架林区绿色财富总值为 236.13 亿元, 自然资源总价值为 46.91 亿元, 占整个绿色财富的比例为 19.86%; 生态服务功能总价值为 189.23 亿元, 占整个绿色财富的比例为 80.14%, 生态服务功能价值高于自然资源价值约 60 个百分点。神农架林区的绿色财富大约是物质财富的 4.6 倍。

黄土高原地区安塞县的农业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其生态系统服务包括土壤保持、水源涵养、CO₂ 固定和 O₂ 释放、维持营养物质循环和环境净化。研究结果显示, 该生态系统服务的总价值达 31.7 亿元, 是产品价值的 170 倍。这也说明即便是长期以来一直被忽视了的脆弱的生态系统也有重要的服务功能。

研究人员还对全国主要陆地生态系统价值进行了测算, 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总价值为 9 170 亿元/年, 其中来自森林生态系统、草地/牧场生态系统、湿地生态系统、荒漠生态系统和农田生态系统的价值分别为 1 410 亿元、1 030 亿元、109 亿元、981 亿元和 1 390 亿元。

这一系列的研究成果, 打破了所谓生物多样性保护投资不能产生直接的经济效益或经济效益很低的说法。

“生物多样性经济价值评价在很多方面是一种非常有用的工具。”欧盟—中国生物多样性项目机构与政策专家张凤春对记者说, 这一工具可以增强人们对于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的了解和保护意识。在制定政策时, 它能够提高人们对于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重要性的认识并增强保护意识。不仅如此, 它还有助于制定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保护政策。

记者了解到, 建立生态补偿机制已经被列为中国政府“十二五”规划中环境保护的内容之一, 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价值评估正是建立生态补偿机制的一项重要基础。